马衡先生魏石经研究资料整理综述

Ma Heng's Research on Stone Classics of the Wei Dynasty: A General Overview

王素

Wang Su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20 Vol.21
故宫学刊
二〇二〇年 总第二十一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DA21010107-王素-CC2017.indd 1 2021/1/20 下午5:12

马衡先生魏石经研究资料整理综述*

Ma Heng's Research on Stone Classics of the Wei Dynasty: A General Overview

王素

Wang Su

内容提要：

马衡先生是近代搜集整理研究汉魏石经的先驱与巨擘，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界仅对他的汉石经研究较为了解，对他的魏石经研究知道不多。本文将先生魏石经研究资料分为公开发表的关于魏石经研究的文字和未经整理的关于魏石经研究的手稿两类，分别进行整理综述，为学界进行先生与魏石经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关键词：

马衡　魏石经　研究资料　整理综述

ABSTRACT:

Ma Heng (1881-1955) is one of the pioneers and giants in th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stone classics of the Han (206BCE-220CE) and the Wei (220-266) dynasties. For various reasons, his accomplishments in the studies of the Han stone classics is much better known in academic circles than those of the Wei stone classics. This article surveys Ma Heng's research on the Wei stone classics in two categories – his publications on this topic and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in the hope of facilitating the studies of Ma Heng's research as well as of the Wei stone classics.

KEYWORDS:

Ma Heng, Wei stone classics, Research resources, General overview

*　本文为作者"故宫学学科建设研究"项目成果的一部分，得到故宫博物院 2011 年度科研项目经费资助，谨此致谢！

DA21010107-王素-CC2017.indd 36　2021/1/20 下午5:12

马衡先生是近代搜集整理研究汉魏石经的先驱与巨擘，但因体弱多病和公务繁忙，迟迟未能将自己搜集整理研究的成果汇辑成书，直到 1952 年“三反”运动受到莫须有的审查，被迫辞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家居期间，才有空暇重操旧业[1]。如先生 1952 年 7 月 22 日日记云：“汉魏石经出土已将三十年，所集材料亦甚丰富，但在此时期因接办故宫之故，不能从事整理研究。今日开始工作，以期完成此著作，但不审能如愿以偿否？”23 日日记云：“先整理熹平石经。”[2] 可见他当时是想将汉魏石经都整理出版，只不过工作不能同时进行，需要有先有后，才决定先整理汉石经，再整理魏石经。可惜仅完成《汉石经集存》初稿[3]，便遽归道山[4]。魏石经的整理，成为永远的遗憾！

五十多年后，虞万里先生重印先生《汉石经集存》，在前面加了一篇自己撰写的《马衡与汉石经研究》，该文在《汉石经集存》重印本出版前，已先行在《兰州学刊》发表，其“摘要”云：“马衡是中国考古学和金石学的先驱，近数十年来研究者不乏，但竟无一篇全面阐述其在汉石经研究上得风气之先和集搜辑、研究之大成的文章。”[5] 说明自己撰写该文的必要性。其实，更需要全面阐述的是先生对魏石经搜集整理研究所做的贡献。原因至少有二：一是近代搜集整理研究汉魏石经，从学术史的次序而言，是先魏石经而后汉石经，没有魏石经研究就没有汉石经研究；二是先生搜集整理研究汉魏石经，汉石经材料虽然存在缺项，但毕竟还有稿本《汉石经集存》传世，而魏石经到目前为止只有《魏石经概述附插图》和《魏正始石经〈尚书·多士〉及〈春秋·文公〉残石跋》两篇小文受到关注，其中一篇内容还不太完整[6]。因此，撰写先生与魏石经研究，无疑更有必要。但如何撰写先生与魏石经研究，却令人倍感困难。

我以为，撰写先生与魏石经研究，至少有两难：一是材料断烂，搜集甚难；二是研究零散，归纳甚难。材料断烂，是因为先生对自己搜集的魏石经材料，没有进行如同《汉石经集存》那样的书稿式整理；研究零散，是因为先生关于魏石经研究有很多心得，但甚少撰成专门文章公开发表。在这种情况下，撰写先生与魏石经研究，条件似乎还不太成熟。如此，我以为，还不如先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具体而言就是做先生魏石经研究资料整理综述工作，待条件成熟，再撰写先生与魏石经研究的专门论文，亦未为晚。

先生魏石经研究资料可分两类：第一类是公开发表的关于魏石经研究的文字；第二类是未经整理的关于魏石经研究的手稿。当然，汉魏石经彼此关联，很难截然分开，不管是公开发表的关于魏石经研究的文字，还是未经整理的关于魏石经研究的手稿，其中都会或多或少涉及汉石经，这一点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并海涵。下面分别进行整理综述。

---

1 王素：《马衡先生对早期甲骨学的贡献》，《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 年第 8 期，第 4-10 页。

2 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1948—195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第 490 页。

3 马衡：《汉石经集存》，科学出版社，1957 年。邵友诚称：“此书为马先生未经整理完成的草稿。”见：《马衡先生遗著：“汉石经集存”》，《考古通讯》1958 年第 4 期，第 77-78 页。此书是稍后请陈梦家先生主持整理才得以出版的。

4 虞万里：《马衡与汉石经研究》介绍马衡先生整理《汉石经集存》，篇题中有“处抑郁之境”五字，颇得其实。关于先生带病整理《汉石经集存》时的情况，详参马思猛：《马衡先生对汉、魏石经的研究和〈汉石经集存〉成书始末》，任昉主编：《故宫治学之道》，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第 9-23 页。

5 虞万里：《马衡与汉石经研究》，先载《兰州学刊》2014 年第 10 期，第 40-48 页，后刊《汉石经集存》重印本卷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 年，第 1-4 页，收入虞万里主编：《七朝石经研究新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 年，第 485-500 页。下引该文，皆不再出注。

6 按《魏石经概述附插图》原名如此，但实际未见所附插图，文中亦未见任何说明；而《魏正始石经〈尚书·多士〉及〈春秋·文公〉残石跋》甚短，仅一页。这两篇小文，原载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 年，第 220-224、250 页，收入虞万里编著：《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 年，第 687、831-833 页。

DA21010107-王素-CC2017.indd 37 2021/1/20 下午5:12

一 公开发表的关于魏石经研究的文字

马衡先生公开发表的关于魏石经研究的文字，除前揭学界熟知的《魏石经概述附插图》和《魏正始石经〈尚书 · 多士〉及〈春秋 · 文公〉残石跋》两篇小文外，还有不少尚未引起学界关注者，兹举四例如下。

（一）魏石经碑行梗概

魏石经碑数，自来记载亦无确数。此石所记表里之数为二十一与八，则都数为二十八审矣。既知都数，则二经之如何安排，即不难推定。惟经文有异同，石经之文未必同于今本。但《尚书》《春秋》二经，《春秋》之异同当较《尚书》为少。今以《春秋》第八碑为准，先求得其前后各碑之行数，再以每碑之行数除之（每碑行数，不尽一律，如第八碑为三十二行，第九碑则为三十四行），即以《春秋》各段之碑次，然后据表里经文以求《尚书》各段之碑次，如此不但今所发见之二经可完全了解，即苏望所刻之次第凌乱者，亦可得其梗概矣。

《春秋》第八碑为三十二行，其前七碑并隐至僖五公篇题在内，共得二百五十四行，当是二碑为三十七行，余五碑为三十六行。苏望刻本之桓公十四年“御廪灾”等字为第七十三行，当在第三碑之首行。自文公二年以下至宣公十一年共得百有两行，是为第九至第十一碑，三碑平均数为三十四行。苏刻本之宣十一年“于瞒函”等字，当在第十二碑之首行。自此以下至襄公三年，共得百二十一行，当占十二至十五四碑。其中三碑为三十行，一碑为三十一行，苏刻本之襄三年“晋夏”等字，当在十六碑之首行。自“晋夏”至“齐世子光”之“光”一段，计有三十一行，亦即第十六碑全碑之行数。

苏氏所刻《春秋》三大段经文，既已求得其碑次，而后《尚书》二大段始可得而推计。《吕刑》最后三行及《文侯之命》十二行，皆在碑之行首，与《春秋》桓公“御廪灾”之部位相同，此二石当为表里；《春秋》之第三碑，即《尚书》之二十六碑，以下之《粊誓》《秦誓》二篇共得二十五行，仅刻至第二十七碑而止。自《大诰》至《吕刑》“五刑”等字，计得四百六十四行，与《春秋》桓十四年至襄三年之四百三十七行约略相当，则《尚书 · 大诰》与《春秋》桓十四年相为表里；是为《尚书》之第十三碑。至今所发见之表里刻者，《多士》与文公一石为《尚书》之第二十碑，《春秋》之第九碑；《君奭》与僖公一石为《尚书》之第二十二碑，《春秋》之第七碑；《多方》与僖公一石为《尚书》之第二十三碑，《春秋》之第六碑；（下缺）[1]

此文原载《凡将斋金石丛稿》卷八《序跋杂文》第七篇《金石杂记》之三，文末“（下缺）”后原有“编者按”云：“此条札记在遗稿中，是撰《魏石经概述》以前所写。”此处所谓“《魏石经概述》”，即指前揭《魏石经概述附插图》。此文在《魏石经概述附插图》前，时间最早，属于先生魏石经研究的奠基之作，故虽后缺，并非完璧，仍应排为第一，以见筚路之功。原本无题，题为本文所拟。原分两段，本文据内容析为三段。

1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 年，第 320-321 页。

DA21010107-王素-CC2017.indd 38 2021/1/20 下午5:12

（二）魏石经概要

魏石经为齐王芳正始中所立，其字体为古文、篆、隶三体。其经数为《尚书》《春秋》二部。《西征记》《洛阳伽蓝记》《隋书经籍志》所载皆同（《唐志》有《左传》而无《春秋经》，疑误），表里各刻一部。其石数则《水经注》云四十八枚，《西征记》云三十五枚，《洛阳伽蓝记》云二十五碑。今以《春秋》字数，依每碑三十二行排比之，并篇题在内，应得二十七碑。《尚书》字数虽多于《春秋》，以每碑三十四行记，二十七碑亦足以容之。则《洛阳伽蓝记》所记之数似为近之。其行款则《尚书》每碑三十四行，《春秋》三十二行，每行皆二十字，三体得六十字，纵横有界线，每三体作一格。惟《尚书》自《皋陶谟》以前，不作三体直下式，一格之内，上列古文，下并列篆隶二体，作品字式，每行三十七格。每碑约可容二十六行。其书人则北魏江式以为邯郸淳书，胡三省《通鉴注》已辟其谬，况晋卫恒《四体书势》明言“正始中立三体石经，转失淳法”（见《晋书·卫恒传》），尤为非淳所书之明证。今细审原石，虽不能定为何人所书（杨守敬据《四体书式》考为卫觊书），然可断言三体非出自一人之手。又古文之书体，品字式者与直下式者不同，古文又不出自一手。此与书汉石经者不止蔡邕一人，殆同一例。或亦如汉石经之具载书人姓名，亦未可知也。

魏立三字石经时，汉石经固犹在也，所以复立三字者，以汉石经皆今文，非古文也。此以古文书其上，虑其难识，复列篆、隶二体于其下。古书之有释文，当以此为权舆矣。其变迁残毁之迹与汉石经同，但在宋时所存残字，较汉石经为尤少。皇祐间，洛阳苏望得故相王文康家搨本，摹刻于石，凡八百十九字，即《隶续》所录之《左传遗字》是也。苏氏此刻，就断剥亡缺之余，而存其完全之字，次第陵躐，不加深考，谓之为《左氏传》，洪氏仍之。清臧琳著《经义杂记》，始从其中分出《尚书》残字。孙星衍《魏三体石经残字考》复以其中《春秋》残字分系诸公。近王静安《魏石经考》又详加分析，辨为《尚书》[的]《大诰》《吕刑》《文侯之命》六段，《春秋》宣公、襄公《经》七段，《春秋左氏》桓公《传》一段（此段二十五字一行直下，石之崩裂作一长行，似无此理，其真伪尚属疑问），并计其字数定为五石，绘图以证明之，而后苏氏摹本之次第陵躐者始复旧观。胡宗愈刻于成都西楼者亦八百十九字，当与苏氏之本同出一源。今二本皆亡，惟存其字于《隶续》而已。

清光绪间，洛阳龙虎滩（在故城中）出一残石，一面存字百有十，一面无字，乃《尚书·君奭》残字。一九二三年一月，洛阳朱圪垱村出一碑，仅存上截，一面存《尚书》[的]《无逸》（十七行）、《君奭》（并篇题十七行）九百七十八字，一面存《春秋》僖公（二十五行）、文公（并篇题七行）八百三十字。其先出之《君奭》残石，即此碑之下方，文相衔接。同时又出一石，一面存《尚书·多士》百三十四字，一面存《春秋》文公百有三字。其后又出残石甚多。据余所见者，《尚书》二百有九字（内有品字式者九十七字），《春秋》百八十二字，其不知属于何经者三十四字。都计前后所出凡得二千五百七十六字，较宋人所见，多出二倍。又《尚书》前数碑之为品字式，尤为自来考石经者所未及知者也[1]。

1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77-78页。

此文原载《凡将斋金石丛稿》卷二《中国金石学概要下》第四章《历代石刻》之三《经典诸刻与纪事诸刻之别》，该节先介绍纪事刻石与经典刻石的区别，然后云:“自有刻石以来，几莫非纪事文字。自《熹平石经》以后，始有经典之刻。”再接叙汉、魏、唐、后蜀、北宋、南宋、清七朝太学石经创建存佚概要。虞万里先生《马衡与汉石经研究》云：“是为石经编入教科书、进入课堂之第一次。”具有特殊意义。其中《魏石经概要》较前揭《魏石经概述附插图》简略，文字亦不尽相同[1]，符合讲义的“概要”体。原本无题，题为本文所拟。原仅一段，本文据内容析为三段。

（三）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序

世之言版本之学者，舍写本外，溯至五代宋椠本尚矣。然此犹非刻本之起源也。吾国版本之最古者，不能不推汉魏之石经。故阮元之校勘《十三经》，首采汉石经也。汉魏立经之事，载籍所记，备极纠纷，今欲知其孰为汉、孰为魏，及同时同地出土之故，请先简单概括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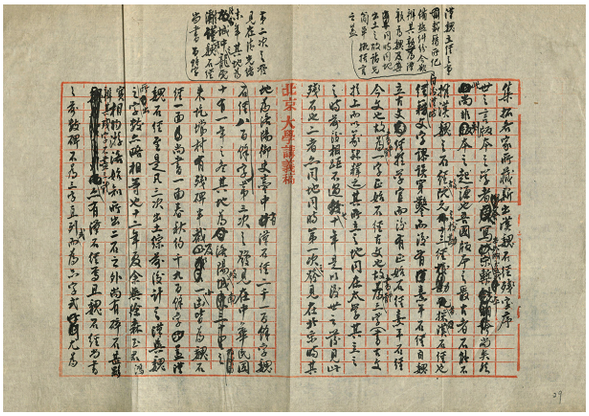
盖自后汉时，经籍文字，谬误穿凿，而后有熹平石经；自魏立古文经于学官，而后有正始石经。熹平石经，今文也，故书体为一字；正始石经，古文也，故书体为三字（书古文于上，而以篆隶释之）。其所立之地，同在太学；其立之之时，前后相距不过七十年。是以后世之发见此残石也，二者亦同地同时。第一次之发见在北宋时，其地为洛阳御史台中，有汉石经二千一百余字，魏石经八百余字。第二次之发见在清光绪末年，其地为洛阳故城中之龙虎滩，仅有魏石经《尚书》百余字。第三次之发见有残碑半截，及一小凵，皆为魏石经，一面《尚书》，一面《春秋》，约千九百余字。盖汉魏石经至是，凡三次出土，综前后计之，汉与魏所出之字数，亦略相等也。

十二年（1923）夏，余与徐森玉（鸿宝）君相约游洛，始知所出二石之外，尚有碎石甚夥，辨其残字，不尽三体，亦有汉石经焉。且魏石经《尚书》之前数碑，不为三体，直列式而为品字，或尤为前人所未及知者也。乃属洛中友人郭玉堂君，代觅碎石，约得二百凵，与徐君分购之。欲一观其出土之地，以多盗故，竟不果往。次年冬始得冒险一履其地，见所谓太学遗址者，已沦为丘虚，仅有碑趺十余，呈露于瓦砾丛中而已。然按其方位，与《洛阳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诸书所载，正相符合，知北宋时及近代之所出者，皆在汉魏立碑之故处，所谓迁邺、迁长安之说，似有疑问，或所迁者为完整之碑，而残毁之石仍留故处欤？

余等得石之后，相与理董而考订之者，惟王静安（国维）先生为最勤，其《遗书》之第二集中之《魏石经考》，大半取材于是。十六年（1927）春，孙伯恒（壮）君议集拓余与徐君所藏石，而益以诸家之所藏，先生闻之欣然，且促成其事。今拓本告成，而先生墓有宿草矣。缅怀往事，能不怆然。

兹编所集，共得八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目中标研字）二石，计一百五十九字；吴兴徐氏（标徐字）九十八石，计三百三十六字；鄞马氏（标马字）九十石，计三百六十七字；潢川吴氏

1 按：其中“清光绪间”，《魏石经概述附插图》作“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一九二三年一月”，《魏石经概述附插图》作“一九二二年冬”。《概述》均较《概要》精确。



图一 马衡《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序》手稿第一页



图二 马衡《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序》手稿第二页

（标吴字）三石，计十七字；胶柯氏（标柯字）五石，计二十字；闽陈氏（标陈字）四石，计十四字；江夏黄氏（标黄字）十石，计五十三字；尚有《公羊》二石，不知藏谁氏，计一百三十二字。都计得一千九十八字。由周希丁（康元）君精拓三十本，分致同好。拓成，孙君嘱余分类编次，录其目弁于简端，虽骐骥一毛，虬龙片甲，不足以窥熹平、正始之全，然于版本校勘之学，或不无裨益欤？

中华民国十有七年（1928）六月二十日

此文原载《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1]，此处系据《艺林旬刊》迻录[2]。前书未分段，未加标点；后刊未分段，以顿号断句。另有写于“北京大学讲义稿”稿纸的手稿（图一、图二），亦未分段，未加标点。此文分段标点，均为本文所析拟。文中所谈与徐森玉相约游洛，详参柳向春《马衡与徐森玉》[3]；托友人郭玉堂代觅碎石，详参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4]。先生主编《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凡出二编，目录已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5]。马思猛先生《马衡先生年谱长编》1928 年 6 月 20 日条全文迻录[6]。

（四）马衡与王国维往来书信

先生与王国维往来书信，保存了大量汉魏石经研究资料，但很少为学界利用。管见所及，仅知虞万里先生《马衡与汉石经研究》引述马、王往来书信较多，但根据的主要是站在王国维一方整理的书信文本[7]。今据

1 马衡编：《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民国戊辰年（1928）夏五月原石拓印本，第 1-2 页。关于此书编辑经过，详参柳向春：《〈集拓汉魏石经残字〉及其传拓人周康元》，《南方都市报》2016 年 1 月 24 日第 GB15 版。

2 马叔平：《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序》，《艺林旬刊》1928 年第 28-31 期第 4 版连载。

3 柳向春：《马衡与徐森玉》（上、下），《紫禁城》2011 年第 12 期、2012 年第 1 期，第 110-111、118-121 页。

4 郭玉堂记曰：“（汉熹平石经）出土处在洛阳故城内，位于洛水南朱圪垱、东大郊两村之北地名岗上。民国十一年（1922）冬，玉堂初见，未及注意。明年春，今故宫博物院院长鄞县马衡叔平及徐鸿宝森玉，由北京至洛，见此石有《论语·尧曰篇》‘费劳而’等字，嘱以重价购之，谓此后多多益善。玉堂始知为汉石经也。嗣此，出土者甚多，金石家著录引据亦繁，而马、徐两氏则最初鉴定之人也。”见：郭玉堂原著，郭培育、郭培智新编：《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汉代·汉熹平石经·熹平四年”条，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 4 页。

5 马衡：《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目》《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目二编》，《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 年，第 341-353、354-365 页。

6 马思猛编著：《马衡先生年谱长编》，故宫出版社，2020 年（待出）。按：此处系据马思猛先生惠赠稿本。在此谨向马思猛先生表示衷心谢忱。下引此著，不再注明。

7 按：虞万里：《马衡与汉石经研究》引述马、王往来书信，主要见于下列二书：（1）王国维：《书信日记》，《王国维全集》卷一五，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年；（2）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新出马思猛先生辑注《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将马、王往来书信整理综述如下[1]。

据马思猛先生辑注《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先生与王国维通信始于 1919 年 12 月 12 日，至 1923 年 5 月 4 日先生致王国维信始提到石经，云：

> 下星期将偕叔蕴（罗振玉）先生作洛阳之游，约旬日可返。闻新出三字石经，洛中尚有原石未剖之本，此行当求之（第 102 页）。

按：此次洛阳之游，罗振玉实际因故未能成行[2]，仅先生与徐森玉偕往。“三字石经”即“三体石经”，也就是魏石经。知先生此行是专为魏石经。同年 6 月 28 日先生致王国维信云：

> 顷抵洛阳，见整本三体石经，其《君奭》篇题仅“君奭”二字，三体共计六字，《无逸》篇末“嗣王其监于兹”亦不损。《春秋》首行“三月丙午”之“午”字篆体，及次行“宋”字古文之半在一小石上，近亦觅得，将来可别拓小纸以补之。知关注念，敬以奉闻。叔蕴先生如尚在京，乞转告之。顷已托人再求一二本，或有可得之希望，必当为罗先生代致一本也（第 104 页）。

此为先生到洛阳后致王国维谈魏石经新发现的信。下有马思猛先生按云：“此次洛阳之行，开启了马衡与王国维长达数年的魏石经资料的收集与考研。”虞万里先生《马衡与汉石经研究》亦云：“今存王、马往来书信，以讨论魏石经为多。”马思猛先生辑注《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中，涉及魏石经的书信，除了前揭二封，还有下列三十封：

1923 年 7 月 14 日马衡与王国维信（第 106 页）
1923 年 7 月 14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109 页）
1923 年 7 月 26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111 页）
1923 年 8 月 14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113 页）
1923 年 8 月 15 日马衡与王国维信（第 115 页）
1923 年 8 月 15 日马衡与王国维信（第 117 页）
1923 年 8 月 16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119 页）
1923 年 9 月 17 日马衡与王国维信（第 121 页）
1923 年 9 月 19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123 页）
1924 年 5 月 26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143 页）
1924 年 11 月 13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155 页）
1924 年 11 月 17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157 页）
1925 年 9 月 2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163 页）

---

1 王国维、马衡著，马思猛辑注：《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下引书信，均在后括注释文页码，释文后均附原信图版，读者可自行检索核对。另按：马、王二人皆属有信必覆的传统学人，本书收录书信，或有往无来，或有来无往，故知佚失甚多，尚不足反映二人通信讨论魏石经之全部。

2 罗振玉：《石交录》云：“方辛酉（壬戌）岁（1922），洛阳出正始三体石经后，予在春明与二三同好约，至洛一访汉太学遗址，乃以事不果。吴兴徐君森玉（鸿宝）与其友（按指马衡）往。”见：《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 3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206 页。另据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一月二十日出刊之《河南第一学生图书馆》第 20 期第 3 版刊载《罗叔言（振玉）先生莅馆之经过》云：“先生于上月二十七日偕其高足商锡永（承祚）君莅馆。”知罗振玉系于 1923 年 12 月下旬到达河南。

DA21010107-王素-CC2017.indd 42 2021/1/20 下午5:12

1925 年 9 月 8 日马衡与王国维信（第 165 页）

1925 年 9 月 9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167 页）

1925 年 9 月 14 日马衡与王国维信（第 169 页）

1925 年 9 月 14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174 页）

1925 年 9 月 19 日马衡与王国维信（第 176 页）

1925 年 9 月 21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180 页）

1925 年 9 月 22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182 页）

1925 年 9 月 24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184 页）

1925 年 9 月 27 日马衡与王国维信（第 186 页）

1926 年 8 月 22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208 页）

1926 年 8 月 26 日马衡与王国维信（第 210 页）

1926 年 9 月 7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212–213 页）

1926 年 9 月 9 日马衡与王国维信（第 216 页）

1926 年 9 月 11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219–220 页）

1926 年 12 月 1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227 页）

1927 年 1 月 17 日马衡与王国维信（第 230 页）

1927 年 1 月 19 日王国维与马衡信（第 232 页）

先生与王国维关于魏石经的通信，从 1923 年 5 月 4 日，到 1927 年 1 月 19 日，至少长达三年八个月。王国维 1927 年 6 月 2 日投昆明湖自沉，即在此之前四五个月，他们还在通信讨论魏石经问题。这些书信，是了解先生魏石经研究的珍贵材料，利用价值极大，值得学界珍视。

此外，我们知道，近代搜集整理研究汉魏石经，以王国维 1916 年发表的《魏石经考》为滥觞。但如虞万里先生《二十世纪儒家石经研究》所说："王国维《魏石经考》首刊于哈同主办的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所影印之《广仓学窘丛书》中，当时因销量无多，传播有限，除沪上学人以地缘之便得见，在全国学界影响不大。六年后，洛阳出土了一千多年来最大的经碑，惊动官方，轰动学界，一时间掀起发掘、收藏、传拓热，由此开启二十年左右的石经学研究。"[1] 所谓"六年后"云云，即指 1922 年 12 月洛阳魏石经大发现[2]。王国维《魏石经考》的定本，实根据此次马衡先生等所获魏石经新资料补正。这就是前揭先生《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序》所说："余等（徐森玉）得石之后，相与理董而考订之者，惟王静安（国维）先生为最勤，其《遗书》之第二集中之《魏石经考》，大半取材于是。"可见王国维《魏石经考》的定本中，也含有先生等的搜集整理研究成果。这是撰写先生与魏石经研究所应注意的。

1 虞万里：《二十世纪儒家石经研究》，虞万里编著：《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 年，第 61 页。

2 马衡：《汉石经集存·概述》亦云："民国十一年（1922）十二月，乡人朱姓以取瓜萎根合药，掘地四、五尺，得巨碑半截，即魏三字石经《尚书》[的]《无逸》《君奭》，《春秋》僖公、文公残碑也。其后出土残石渐多，始发见一字石经。"见：《汉石经集存》，科学出版社，1957 年，第 1 页。知此次发现以魏石经为主。

DA21010107-王素-CC2017.indd 43 2021/1/20 下午5:12

二　未经整理的关于魏石经研究的手稿

1955 年 3 月 25 日下午，先生觉身体极度不适，在其孙马思猛先生搀扶下，乘车急往北大医院就医，26 日凌晨，抢救无效逝世，享年七十五岁[1]。不久，其子马彦祥先生便将先生遗物，包括文物与手稿，全部捐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同年 8 月 19 日，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将这批文物与手稿，全部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据故宫博物院文物移交档案“55 文物字第 297 号”记载，在“马叔平先生捐献文物书籍总目”下，有“马衡先生遗著手稿草目（附)”，凡十三项、三十四种，其中，与汉魏石经有关者，除已刊论著手稿外，还有“洛阳访古日记”“关于汉魏石经的杂稿一包”“各色杂稿一包”等。先生遗著手稿后来拨交故宫图书馆资料室收藏，直至近年始再次整理并扫描成图版，与汉魏石经有关者，散属多个文件夹，最重要的为“汉魏石经卷”文件夹，此外就是“凡将斋杂录卷之一”至“凡将斋杂录卷之五”五个文件夹。“汉魏石经卷”文件夹，除已刊论著手稿外，还有《汉石经》（残石统计)、《汉石经残石拓本目录》《魏石经残石拓本目录》《凡将斋藏汉魏石经残石目》《伪造汉石经》《钱泳藏汉石经拓本证伪》（此文又见“凡将斋杂录卷之三”)、《汉魏石经徵序》等未刊手稿，以及各类关于石经的笔记和汉魏石经残石复原图等。“凡将斋杂录卷之一”至“凡将斋杂录卷之四”四个文件夹，是关于甲骨、石鼓、简牍、石经、石窟、石刻等资料的摘抄与笔记，其中石经部分主要是七朝石经资料的摘抄与笔记。“凡将斋杂录卷之五”是文章草稿和定稿，有《中国教育全书石经条文》《考古人员训练班第四讲古代铭刻教课大纲》《考古人员训练班第四讲古代铭刻 · 刻经 · 儒家刻经》《世界最古刻本书之新发见》《中国古代铜器略说》《三千年前的龟甲与兽骨》等。兹选其与魏石经研究有关者，整理综述如下。

（一）世界最古刻本书之新发见

在印刷术未发明以前，所有书籍几无一不出于写录，以故辗转传讹，无从是正。中国在一千七百余年以前，即感觉此弊，谋所以补救之者。乃使诸儒正定经籍文字，刻之于石，垂诸久远，使天下后世据此以为定本。以其为石本，故谓之石经。世界书籍之版本当莫先于此矣。抑亦文化史上可以纪念之盛举也。今试述其事实如下。

《后汉书 · 蔡邕传》曰：“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西纪一七五），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此段记载，对于刻石经之始末，言之最详。惜其时拓墨之法尚未发明（唐石经分列刻石，即所以备拓墨装卷子者），不能如印刷物之家置一编，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以千计，其效用亦不可谓不广矣。且不但当时也，后之读书者亦莫不就碑摹写。

《晋书 · 赵至传》曰：“至年十二（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有人疑康之所

1　马思猛编著：《马衡先生年谱长编》，故宫出版社，2020 年（待出)。

写乃为正始石经书丹，非摹写之谓。然考至卒于太康中，年三十七，则遇康写经之时，当在正元、甘露之间，其时正始石经立十余年矣）。”

又《石季龙载记》曰：“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

其效用既如此之广且久，故六十年之后即有仿行而补刻之者。

《晋书·卫恒传》《四体书势》曰：“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谷水）曰：“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

《隋书·经籍志》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魏石经乃三字，非一字。说见后）。”

汉立石经之地为太学，魏立石经之地亦为太学（魏之太学即汉之太学）。立石之时虽不同，而确同在一地。其所以补刻者，以汉立之经皆今文，无古文，故取古文本刻石，而又以篆隶释之也。

其后至北魏时（当西纪五世纪），冯熙、常伯夫相继为雒州刺史，取其碑石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颓落，间有存者，委于榛莽（见明于慎行《笔麈》）。又其后而有迁徙之事：

《魏书·孝静帝纪》：武定四年（西纪五四六）八月，“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

《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元年（西纪五五〇）八月，诏曰：“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

《北周书·宣帝纪》：大象元年（西纪五七九）二月辛卯，“诏徙邺城石经于洛阳。”

《隋书·刘焯传》：（开皇）六年（西纪五八六），“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等考定。”

《隋书·经籍志》：“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祕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西纪六三〇顷），祕书监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祕府。”

据此，则汉魏石经凡三徙：始由洛阳迁邺，又由邺徙回洛阳，最后乃由洛阳徙长安。自唐初魏征收聚之后，其踪迹遂不可问矣。至北宋时，洛阳始有残石发见。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曰：“此石刻在洛阳，本在洛宫前御史台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时时得之，若骐骥一毛，虬龙片甲。今张焘龙学家有十版，最多。张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晋玉家有小块。洛中所有止此，予皆得其拓本。”

其后洪适又以所得残字著之《隶释》及《隶续》，计汉石经《尚书》五百四十七字，《鲁诗》百七十三字，《仪礼》一百一字，《公羊传》三百七十五字，《论语》九百七十一字，合二千一百六十七字。魏石经《尚书》《春秋》（《隶续》统题为《左传》遗字）八百十九字。并重刻于会稽蓬莱阁（洪重刻本汉石经无《鲁诗》）。自此以后，不闻更有发见。直至清光绪间（西纪一九〇〇顷），洛阳龙虎滩出三字石经残石，为《尚书·君奭》之文，存百余字。民国十一年（西纪

一九二二）冬，洛阳城东三十里朱圪垱村发见一碑，仅存上截。一面为《尚书》[的]《无逸》《君奭》，一面为《春秋》僖公、文公，存千七百余字。而先出之《尚书·君奭》一石，即此碑之下方，文相衔接。同时又出一石，一面为《尚书·多士》，一面为《春秋》文公，存二百余字。自经此次发见之后，而残石碎石时有出土。今就见闻所及，举其存字如下：

汉石经

《周易》三字

《鲁诗》并《校记》七十三字

《仪礼》三十三字

《春秋》一百六十二字

《公羊传》并《校记》一百三十七字

《论语》三十四字

不知属何经者三十五字

《石经后记》一百九十五字

都六百七十二字

魏石经

《尚书》（并前述三石计之）一千四百十字

《春秋》（并前述二石计之）一千三十八字

不知属何经者八十二字

都二千五百三十字

是此次之所发见者，汉石经仅当宋代三分之一，魏石经则超过二倍而有余矣。以两次之所发见，可以考知其事实者，约得结果如下：（一）经数；（二）书体；（三）参与是役之人；（四）行格；（五）石数。

今请次第述之。

（一）汉石经之经数，据《后汉书》[的]《灵帝纪》《卢植传》《儒林传序》《宦者传》皆曰“五经”，《蔡邕传》《张驯传》皆曰“六经”，而《隋书·经籍志》则曰“七经”。宋代所发见者五：曰《尚书》，曰《鲁诗》，曰《仪礼》，曰《公羊传》，曰《论语》；此次所发见者六：曰《周易》，曰《鲁诗》，曰《仪礼》，曰《春秋》，曰《公羊传》，曰《鲁论》。综合计之，则为“五经”二传：一、《周易》，二、《尚书》，三、《鲁诗》，四、《仪礼》，五、《春秋》，六、《公羊传》，七、《鲁论》。然则《后汉书》谓为“五经”“六经”，《隋书·经籍志》谓为“七经”，皆不得谓为非也。魏石经之经数，据《西征记》（《太平御览·文部》引）、《洛阳伽蓝记》《隋书·经籍志》皆云《春秋》《尚书》，而今所出者亦祇此二部。此皆可以确定者也。

（二）书体之问题，纠纷最甚。其原因则以汉魏石经同在一处，见之者每易混淆。自《后汉书·儒林传序》指熹平所立者为古文、篆、隶三体，而《隋书·经籍志》遂以正始所立为一字。《洛阳伽蓝记》亦以三字为蔡邕笔之遗迹。据卫恒《四体书势》所言：“魏初传古文出于邯郸淳。至正始

中立石经，转失淳法。”是以古文者属之魏，古文即非一字矣。郦道元《水经注》亦明言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经。夫卫恒，晋时人，郦道元，北魏时人，皆得亲见并立太学之汉魏石经者也。范晔为晋末宋初时人，虽亦有亲见之可能，而身在南朝，其见闻殆不如卫、郦之亲切。杨衒之以后魏人而专记洛阳掌故，其所言宜若可信。而两次发见之三字石经，并无蔡邕笔之纪载。《隶释》所录一字石经，上有马日磾、堂谿典等姓名。则知郦是而杨非矣。此疑问在宋时发见碑石后即已证明，本无争辩之余地。而今日犹有笃信《后汉书》之说者。故亟应表而出之曰：一字者为汉熹平石经，三字者为魏正始石经。

（三）参与刻石之事者，汉石经犹略可考见，魏石经则更无可考。兹据《后汉书》及汉残石之所记举其姓名如下：

蔡邕、堂谿典、杨赐、马日磾、张驯、韩说、单颺、卢植、杨彪、李巡

以上见《后汉书》。惟堂谿典、马日磾二人又见第一次发见之碑。

赵噩、刘宏、张文、苏陵、傅桢、左立、孙表、陈兴

以上见第一次发见之碑。

刘宽

以上见第二次发见之碑。

《蔡邕传》谓邕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但验之诸经之字体，绝非一手所书。则上列诸人，除陈兴为石工外，其余诸人必皆分任其事者。

魏石经据北魏江式说，以为邯郸淳所书，然胡三省《通鉴注》亦已辨之。况卫恒《四体书势》明言正始中立石经转失淳法，则非淳书明矣。今就新出之石刻辨之，《尚书》《春秋》二经亦不出自一手，且所据之古文本亦各不同，以同一古文之字，二经往往异体也。不独二经不同，即同一《尚书》，而品字式（说见后）与直列式亦往往有异，则其时参与其事必有多人，或亦如汉石经之署名碑末，未可知也。

（四）据《洛阳伽蓝记》载朱超《与兄书》云：“石经高丈许，广四尺。”《西征记》云：“碑长八尺。”《水经注》云：“石长八尺，广四尺。”今次发见之魏石经碑，其广确为四尺，以字数推其长度，约当八尺。汉石经碑之高广虽不可知，然其残石之厚与魏同，以每行字数推之，其长度亦当为八尺。况魏石经乃补汉石经所阙之古文，其高广亦当相等也。汉石经每行自七十字至七十三字不等，每碑约可容三十五六行，无纵横之界格。魏石经凡二种：一种为每行二十格，每格三体直列。《尚书》每碑三十四行，《春秋》则三十二行。一种为每行三十七格，每格上列古文，下并列篆隶二体，如“品”字式，每碑约可容二十五六行——但此式仅《尚书·皋陶谟》以前如此，其余均不作此式也。经碑之排列，当相比如堵墙，汉石经每经为一堵，计每经之字数而两面刻之，一堵自为起讫。魏石经则为一堵，一面刻《尚书》，一面刻《春秋》。此可由残石之两面刻文者推知之也。

（五）汉石经之碑数，据《西征记》云四十枚，《洛阳记》云四十六枚，《洛阳伽蓝记》云四十八碑。今以上述行格计之，大约四十六或四十八之说较为可信。魏石经之碑数，《西征记》云三十五枚，《洛

阳伽蓝记》云二十五碑，《水经注》云四十八碑。此三说中，三十五与二十五祇差一字，三与二在字形上尤易相混，二书必有一误。至《水经注》四十八之数，乃汉石经之数也。今以一面所刻《春秋》字数计之，当有二十六碑始能容之，益以篇题十二行，当有二十七碑。《尚书》字数，据唐石经所载，除伪古文二十五篇并孔安国《序》外，应得一万八千余字。假定品字式者四碑，直列式者二十三碑，并篇题计之，亦足以容之而有余矣。故魏石经之碑数当为二十七碑，《洛阳伽蓝记》所载似为近之。

其事之可知者如是而已。至若文字与今本之异同，乃属于校刊范围，兹不备述。

此文今存两份手稿：一份为草稿，一份为定稿。均写于自印“凡将斋”稿纸。此处据定稿迻录，惟格式稍有调整。此文与已刊《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魏石经概述附插图》等文分论汉魏石经不同[1]，属于综论汉魏石经的基础性论文，年代似较早，反映当时马衡先生是想将汉魏石经一起整理的。

（二）汉魏石经徵序

中国的封建制社会绵延不绝地保持了二三千年，在世界各国中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基本原因，自然是生产力发展之运滞，而上层建筑还有一种特殊势力支持着它。这特殊势力是什么呢？是中国所特有的儒家学说。儒家学说是封建时期的产物，也就是封建主——帝王统治人民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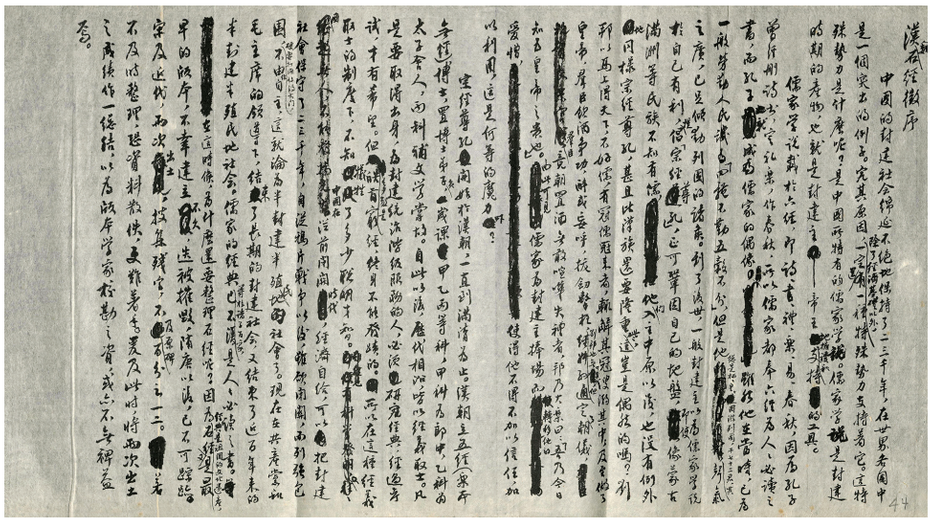
儒家学说载于《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为孔子曾经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所以儒家都奉《六经》为人人必读之书，而孔子也就成为儒家的偶像。虽然他在当时，已为一般劳动人民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是他总是栖栖惶惶，周游列国，干七十二君，其声气之广，已足倾动列国的诸侯。到了后世，一般封建主以为儒家学说于自己有利，提倡“宗经尊孔”，正可巩固自己的地盘，即使像蒙古、满洲民族，本不知有儒，但他们入主中原以后，也没有例外地同样宗经尊孔，甚且比汉族还要隆重些，这岂是偶然的吗？刘邦以马上得天下，“不好儒，有冠儒冠来者，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及至作了皇帝，“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感觉头痛而无可奈何，但经叔孙通定了朝仪，群臣“竟朝置酒，无敢喧哗者”，邦乃大乐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由此可见儒家为封建主捧场而转移其爱憎，使得他不得不加以信任，加以利用，这是何等的魔力吓。

宗经尊孔开始于汉朝，一直到清朝为止。汉朝立“五经”（《乐》本无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岁课甲、乙、丙等科，甲科为郎中，乙科为太子舍人，丙科补文学掌故。自此以后，历代相沿，皆以经义取士。凡是要取得出身，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必须阅读经典，经过考试，才有希望。但皓首穷经，终身不能发迹的还是占多数。所以在这种经义取士的制度下，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聪明才智。朱元璋作了皇帝，看见应试的士子，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2]

---

1 马衡：《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原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3 年，与《魏石经概述附插图》均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99-210、220-224 页，又收入虞万里编著：《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 年，第 76-83、831-833 页。

2 按：此语原出唐太宗，非朱元璋，马衡先生偶尔误记。唐末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 述进士上篇》：“文皇帝（指唐太宗）修文偃武，天赞神授，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图三　马衡《汉魏石经徵序》初稿手稿

中国在从前闭关时代，经济自给，可以把封建社会保守了二三千年。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虽欲闭关，而列强包围，硬要打开你的大门，不由你自主，这就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了。现在在共产党和毛主席地领导下，结束了长期的封建社会，又结束了近百年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儒家的经典等于诸子百家，已不复是人人必读之书，也没有它的特殊势力。在这时候，为什么还要整理石经呢？因为儒家经典是祖国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着文学及历史等资料，石经又是最早的刻本，不幸建立不久，迭遭摧毁，隋唐以后，已不可踪迹。宋及近代，两次出土，搜集残字，不及原碑百分之一二。若不及时整理，恐资料散佚，更难着手。爰及此时，将两次出土之成绩做一总结，既以保存其真相，又为版本学家校勘之资，或亦不无裨益焉。

此文基本用白话文写成，充满新思想，时间推测是在 1951 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反映当时马衡先生仍是想将汉魏石经一起整理，故定名为《汉魏石经徵》，并提前为之撰《序》。不料计划被接踵而来的“三反”运动彻底打乱。等到审查结束，先生身体与精力已大不如前，只能放弃原计划，先整理《汉石经集存》[1]。此文现存二份手稿：第一份手稿改动较多，当是初稿（图三）；此处迻录的是第二份手稿，虽然仍似未定稿，但改动已经不大了。

（三）考古人员训练班儒家刻经讲义

儒家的刻经以汉灵帝熹平四年的石经为最早。当时因为读书的人各自抄写，错误百出，所以刻一个标准本子立在太学，以便读者传抄校对。刻的经一共有七种：（一）《鲁诗》（非现在的《毛诗》），（二）《尚书》，（三）《仪礼》，（四）《易经》，（五）《春秋》（《公羊经》），（六）《公羊传》，（七）《论语》。东汉的太学在都城的南面，即现在洛阳南朱圪垱村，三十年前出土残石甚多，现在还时有发现。

1　马衡另有一篇《〈汉石经集存〉原序》，与此文风格近似，疑是根据此文的改写本。见：《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 年，第 225-226 页。

汉末魏初古文经学已盛行，而熹平石经都是今文，没有古文。所以在魏正始年间，又刻了两部古文经，一部是《尚书》，一部是《春秋》，与汉石经同立于太学。魏石经既是古文，不是人人所能认识，所以在每一个古文之下，又写上一个小篆，一个隶书，因之后人称之为三体石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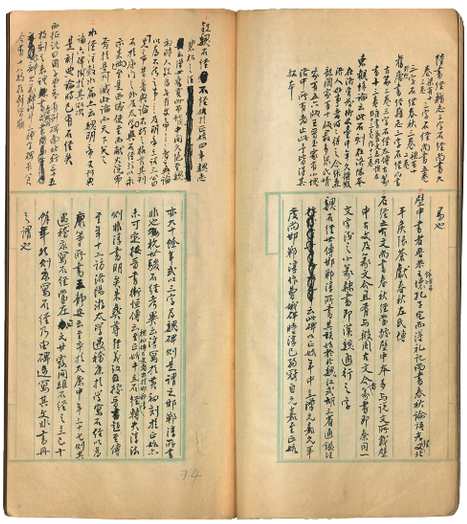
此文系从《考古人员训练班第四讲古代铭刻·刻经·儒家刻经》讲义中节录。据先生 1952 年 7 月 30 日日记："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送来考古人员训练班教学计划。列余名于'文物常识、铜器及古代铭刻'教研组内，拟与立庵联系再作准备。"8 月 20 日日记："赴北大红楼晤裴文中、唐立庵，接洽考古人员训练班讲课问题。"8 月 22 日日记："在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古代铭刻、石刻一小时。"8 月 23 日日记："赴考古人员训练班讲课两小时，觉甚累。"8 月 25 日日记："赴北大红楼讲课两小时。"8 月 26 日日记："考古训练班学员参观北大文科研究所，为之指导说明。"[1] 不赘举。知考古人员训练班是在 1952 年举办，7 月下旬拟定计划，8 月下旬正式授课，安排很紧凑。其时，先生刚从"三反"运动学习班解脱未久，获得过首届考古人员训练班讲课和指导机会，自当全力以赴，即使感觉"甚累"，也在所不惜。这里节录的两段提纲式讲义，虽然不长，且属常识，但对先生来说，应具特殊意义。

（四）魏石经资料摘抄与笔记

先生关于魏石经资料摘抄与笔记，散见多个文件夹，以"凡将斋杂录卷之四"文件夹最为丰富。其中有线装册页，封皮用铅笔写有"第二册"三字，共二十叶，每半叶九行，魏石经资料摘抄与笔记约占三叶半，共二十多条，有的写于格内，有的补写于天头，格内每条均用朱笔标序号，连属，共十条，天头另用朱笔标序号，但不连属，共十多条（图四）。

这里先迻录三条：

《后汉书·儒林传序》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篆书，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也，主于徒隶，从简易也。"



图四　马衡魏石经资料摘抄与笔记手稿第一叶下与第二叶上

壁中书者，鲁恭王（余，景帝子）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

石经之古文《尚书》《春秋经》，当据壁中本，多与《说文》所载壁中古文及篆文合，且有与殷周古文合者。篆书即秦同一文字后之小篆，隶书即汉魏通行之字。

这三条笔记均写于格内，用朱笔分别标 1、2、3 序号，主要解释魏石经古、篆、隶"三体"的来历与意义，属于魏石经研究的基本问题，故排在最前。

接着迻录二条：

1　马衡著、马思猛整理：《马衡日记（1948-195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年，第 491、496-498 页。

疑魏石经不经始于正始四年。《魏志》裴松之注云:“汉世旧贡此布(火浣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为无有。文帝……著之《典论》,以为不然之事。……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献火浣布焉,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

《水经注·谷水篇》亦云魏明帝又刊《典论》六碑,附于其(石经)次。是刻《典论》时已有石经矣。

此二条笔记写于天头,用朱笔分别标 1、2 序号,主要是对魏石经的镌刻时间进行质疑。因为史载魏石经刻于齐王芳正始四年(243),而明帝于黄初七年即位(226),改明年为太和元年(227),如果其时已有石经,则早于正始四年十余年。但马衡先生公开发表的关于魏石经研究的文字和未经整理的关于魏石经研究的手稿,对魏石经的镌刻时间均未质疑。就此而言,此二条笔记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再迻录二条:

《春秋》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字,以每碑六百四十字计之,当容二十六碑,并篇题十二行,当益一碑。

《尚书》字数不可知。据唐石经载《尚书》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除伪古文二十五篇并孔安国序八千四百八十四字,应得一万八千六百五十字。假定品字式者(每行卅七字,每碑廿五行,都计九百廿五字)四碑,计三千七百字。直下式者廿三碑(每行二十字,每碑卅四行,都计六百八十字),统计一万五千六百四十字。则廿七碑所容,合一万九千三百四十字,并篇题在内,亦有余矣。

此二条笔记写于天头,未标序号,从内容看为一组,分记魏石经《春秋》《尚书》二经碑行数字统计结果。第二条笔记中“计计”二字,一在行末,一在行首,似衍一“计”字。关于魏石经《春秋》《尚书》二经碑行数字,先生已刊《魏石经概述附插图》和前揭诸文多已论及,与王国维《魏石经考》不尽相同,有兴趣者可以自行比较,这里就不赘述了。

先生关于魏石经研究的资料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这是撰写先生与魏石经研究的珍贵资料,值得研究者继续发掘和进一步整理。近代搜集整理研究汉魏石经,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盛事。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石经研究本身的难度,近几十年来,关注者寥寥。直到 2013 年,虞万里先生独具慧眼,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近代搜集整理研究汉魏石经的成绩与贡献,才重新受到学界的重视。虞万里先生对近代搜集整理研究汉魏石经的成果,进行了细致的爬梳,并分门别类整理出版。还呼吁应在汉魏石经研究基础上建立“石经学”,认为这种“集文献、文字、文本、碑刻、经义、经学史、历史于一身的石经学,有其独特的研究视野与路径”[1],值得学界深入研究。本文整理综述的先生关于魏石经研究的资料,视野广阔,路径不一,希望能为“石经学”的建立贡献绵薄之力。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1 虞万里:《石经研究与石经学之建立》,《光明日报》2017 年 8 月 2 日第 11 版。

DA21010107-王素-CC2017.indd 54 2021/1/20 下午5:12